

赵守麟 主编  
新华社 供片

红



血

伟人名人

下

情趣

情



# 红照片·伟人情趣

(下)

赵守麟 主 编  
新华社 供 片

吉林摄影出版社

**红照片——伟人名人情趣**

**赵守麟等 编著**

---

**责任编辑：李天民 张立君 责任校对：陈学文 封面设计：金雅庆**

---

**出版：吉林摄影出版社 850×1168毫米 32开本 400千字  
(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 1998年10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发行：吉林省新华书店**

---

**印刷：长春市兴华印刷厂 24.625印张 印数：1-10 000套**

---

**ISBN 7-80606-258-0/J·141 定价：68.00元**



## 将军县里走出的 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

湖北省的红安县(原黄安)，是闻名中外的将军县；董老就是红安人。

董老是我们党的元老，建国后，中共一大的十三位代表中，走入党的最高领导层的只有毛泽东主席和董老。

董老的革命生涯，可以追溯到辛亥革命以前。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董老孜孜以求，克己奉公，为党和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在生活里，也为我们树立了千秋风范。

## 童 年

大别山南麓，倒水河畔，有个风景秀丽的小城镇，这就是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城。1885年3月5日，董必武就出生在这个秀丽而又偏僻的山乡小城镇里。

董必武的老家，原住在离县城3华里的朱家湾。由于当地人多地少，祖辈们就从农村迁居到黄安县城，主要靠摆小杂货摊子，卖香烟、糖果之类的东西谋生，还在乡下种着两亩薄地。董必武的父亲叫董文基。董文基兄弟8个，他排行老三，是个忠厚老实的乡土教师。董必武的母亲蔡氏，是个厚道、正直、勤俭的家庭妇女。董必武有两个姐姐，一个弟弟。他小时候叫董贤琮，后来在省城读书时又起名叫董用威，参加革命后改名叫董必武。

当时，董必武全家有二三十口人吃饭。除父亲和伯伯、叔叔们所得的一些收入外，还靠他的母亲和婶婶们纺棉花线过日子。

董必武不到8岁就开始发奋读书。他天资聪明，学堂里教的书，读二三遍就能背诵，加上学习刻苦用功，文章写得也很清通，远远超出学堂规定的课文要求。于是，他就到处借书读。十多岁的年纪，就读了《水浒》、《三国演义》、《红楼梦》等书籍。

董必武还刻苦练习毛笔字。他练字的决心，是从父亲被坏人侮辱的一件事上激发起来的。有一年，董文基为了养家糊口，到麻城镇附近教书。当地一些不三不四的文人自以为才华出众，要与董文基这个外地来的先生比比高低。董文基的文采是不错的，诗、词、歌、赋样样都通，与那些所谓文人对答如流，把他们一个个斗败了。于是，他们又想出一个歪点子：对对子，当场用毛笔字写下来。一个绅士模样的人走过来，提笔写出“万般皆下品”五个字。董文基也不客气地挥笔写道：“耕耘志气高”。那些人围上来，有的歪头斜脑，有的咧嘴嘲笑：“字写得像鸡爪子，东倒西歪；学



问也太浅薄了，‘唯有读书高’的句子都不知道。”

这时，跟随父亲读书、一直站在一边的董必武，对这种侮辱父亲的行为，看在眼里，气在心头，恨不得跑上前去与他们比试比试，或者痛痛快快地揍他们一顿，可是自己的本事太小了。从此，董必武暗下决心，一定要读好书，写好字。在父亲和老师的教导下，他每天练字，从不辍笔。为解决纸张困难问题，他想了很多办法。在大、小字本上写“套”字，大字行间写小字，小字写满了再写大字。一张纸正面写满了，再写反而。或者在“小沙盘”上划字，尔后又在“方漆牌”、“玻璃板”、“细石板”上练字。就是这样，董必武日以继夜地写呀、练呀，终于练就了一手好毛笔字。

## 考秀才

董必武是一个从旧社会走过来的共产党人。他在少年时代所处的社会，决定他只能走念书、科考、做官的道路。然而，历史却改变了他的选择。

1903年，董必武已经是18岁的青年人了，父亲决定让他去考秀才。早春时节，董必武和两位同乡，一起赴黄州府应考。

功夫不负有心人，董必武在黄州府一举考中了秀才。家里人听到这个消息，高兴极了。亲朋好友，左邻右舍，都为董家有了个秀才而欢欣鼓舞。人们迎在街头，买好了鞭炮准备欢迎他。可是，董必武却绕小路悄悄地回到了家里没有接受亲人的欢迎。为此，家里的人都不高兴，可他却不以为然，因为他不想那样炫耀自己。

董必武考上秀才，全家的税收就免了。对于董必武的家庭来说，无疑减轻了不小的负担。但对于董必武本人来讲，并没有得到什么大的好处，反而挨了一次毒打。一天，他和几个同学在街上闲逛，恰好碰上抚台大老爷上堂，董必武就悄悄地在后面跟了

进去。当抚台往堂上一坐，他忍不住向堂上看了一下。这一看就遭透了，被一个衙役发现，众役猛虎般地扑过来，一下子将他抓住，翻倒在地就打了起来，直打得他头昏眼花，浑身疼痛。一顿毒打之后，倒使年轻的董必武清醒了许多，使他看出了清王朝的腐败和无能：“这么庞大的清王朝，居然怕人怕到这个程度？这样的统治还能继续下去吗？”由此，他就萌发了反对清王朝的念头。

为了实现反对清王朝的理想，董必武一心想当兵。那时，省里恰好办了一所武普通学校，董必武就去应招投考。但因年龄太小，投考未成。不久，董必武又考上了文普通学堂。他在学堂里学习努力，成绩名列前茅。这时，他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并担任同盟会湖北支部的评议员，积极参加了辛亥革命，成为有名的革命党人。1914年，董必武东渡日本留学，毕业后回国参加了革命党人领导的反袁斗争。俄国十月革命后，董必武逐渐接受了马列主义，积极投身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和革命斗争，成为一名卓越的共产主义战士。

### 酸江豆与臭豆腐

董必武的生活十分俭朴，特别是对饮食，他从来不讲究，但对家乡红安特有的泡酸江豆和臭豆腐、臭皮子却十分喜好，几乎把这些东西作为自己的主菜。

早年，董必武在湖北小住的时候，一到吃饭时就想吃酸江豆和臭豆腐。进城以后，仍然保持着这种嗜好。每当吃饭，看到臭皮子，他就会笑哈哈地说：“好呀，吃臭皮子，真开胃哟！”为了使董必武能吃上臭皮子，夫人何连芝只好学着做。

董必武不仅自己喜爱吃家乡菜，而且也喜欢为客人做家乡菜。当家里来了客人，他常常帮老伴出主意，经常是做和菜。和菜是董必武的家乡菜，其做法是：摊个蛋皮切成丝，加入炖着肉丝

和豆腐丝的锅里，再加上黄花、木耳，最后下粉丝。董必武吃这个菜特别来劲，总是用大筷子夹。别人笑他，他却说：“好吃呀！我大筷子夹，别人才能下筷子嘛！”他想到客人既要吃饱，又要吃好。和菜和红烧肘子这两种很实惠的菜，几乎成了董家的传统菜。

董必武吃饭时，有一个菜，特别是有一个豆腐或者豆腐汤就很满意了。一天，女儿楚青奇怪地问：“爸爸，豆腐有什么好吃的？我就不喜欢吃。”董老淡淡地一笑，说：“你不喜欢？豆腐的味道你尝不出来，当然不喜欢。可是成年人能吃得出豆腐的味儿，所以成年人就喜欢吃豆腐了。还有豆芽，这也是只有我们这些老年人才吃得出味儿来的好东西。对不对？”他又回头问老伴：“你说呢？”“那还用说吗？”何连芝最喜欢吃的就是白水煮豆腐，她当然同意董必武的看法了。

董老夫妇不但自己生活朴素，而且对子女的生活要求也很严格。女儿楚青上学时，何连芝就对大师傅说：“楚青早上上学，只把剩菜剩饭热热就行了。”可大师傅却总是打个鸡蛋，把剩饭一炒，给楚青做早饭。刚开始时，楚青吃得很香，但时间一长，就吃腻了。她见同学们早上吃的有火烧、油饼、红薯，真羡慕极了。就向妈妈提出要几角钱，买火烧、油饼吃。妈妈最初不同意，可她左缠右磨，只好给了她两角钱。董必武知道此事后，严肃地批评楚青：“吃炒鸡蛋饭都腻了！你知道不知道，我年轻的时候，家里对我的特殊优待，就是吃一餐炒鸡蛋饭呢！”这天晚饭后，董老又和楚青一块散步。他和气地、充满慈爱地对楚青说：“楚青，我像你这么大时，家里很穷，又是一大家人，每天只能吃两顿稀饭。只有过节时，才可以吃一顿干饭。分稀饭，是我的奶奶掌勺，每人一勺。我的爸爸和我呢，在外边教书，挣的钱交给这个大家庭，所以只有我们两个人能受到优待，可以吃一餐干饭。别人却喝着粥，包括我的妈妈。这餐干饭，有的时候，最好的就是鸡蛋炒饭咧，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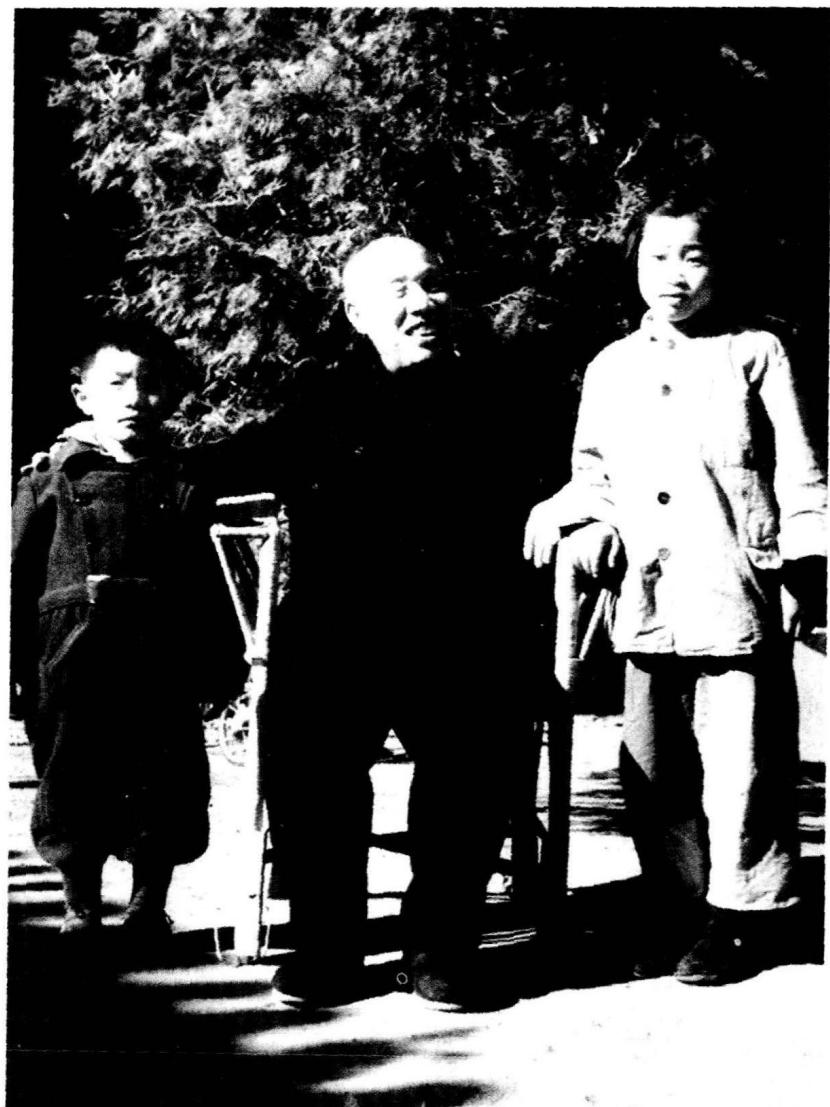
好吃哟！你倒怎么吃腻了？”楚青听着爸爸的话，默不作声。以后吃饭时再也不挑挑捡捡了。

## 背诗教女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董必武特别喜欢这首诗，经常反复吟唱，还时而以这首诗教育自己的孩子们。

董必武晚年多病，每次生病都下不了床。有一次，他的病刚刚好转，就和全家人一块吃饭。他看到老伴为庆祝自己又一次康复，准备的一桌丰盛的饭菜，忽然吟起了“锄禾日当午……”这首诗。不知是想起了幼年时的清苦生活，还是想起了长征时搓的几粒青稞？抑或是感慨肩担重任，却疾病缠身，做老骥之叹？他拿着筷子，缓缓地拨动着碗中的米饭，神态是那样深沉。尤其是“粒粒皆辛苦”一句，抑扬顿挫的浓重乡音动人心肺。一会儿，他又冲着老伴说：“你看，多白的米呵！”老伴用筷子挑了挑饭，笑着说：“快吃噢，凉了！”董必武笑了笑又冲着小女儿说：“楚青，‘粒粒皆辛苦’，你懂不懂？从耕到种，除草、施肥、灌溉，如果风调雨顺，没有虫害，春种才能秋收！你妈妈是个行家，是不是！”他又把脸转向老伴。何连芝一嗔：“我算什么行家？快吃吧！”董必武对小女儿说：“‘粒粒皆辛苦’，这首诗只有四句，很好背，我教你，好不好？”不等女儿回答，他又接着以严肃的口气说：“吃了饭就到办公室来，我教你！”

可是，小女儿并没有去，因为她怕自己严厉的爸爸。吃晚饭时，她只想快吃完一走了之。可董必武像并不急于吃饭似的，又开始背诵“锄禾日当午……”，还用筷子拨动着一粒粒大米。小女儿三扒两赶地吃完了，丢下碗转身要走。父亲叫住她，说道：“你看，你看！碗里、桌子上有多少饭粒？‘粒粒皆辛苦’，粒粒不能



董必武同女儿、幼子在北京。

丢！”女儿茫然地看着掉落在桌上的饭粒，又看了看父亲。“拣起来吃了。”董必武又一脸笑容，但声音威严地说。慑于父亲的威严，女儿把掉在桌子上的饭粒一粒一粒拣起来吃了，把碗里剩下的饭粒也扒拉干净，才走了出去。

## 晚年的心愿

50年代末期，董必武因多年劳累，不断患病。他感到自己年事已高，健康状况欠佳，担心贻误工作，便向党中央申请，不要再安排他担任国家机关的实际职务了。1957年3月，经再次申请，党中央和毛主席同意了改换他的工作，但仍希望他勉为其难，为党为人民负一定的责任。1959年4月和1965年1月，在第二届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董必武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后来，又代理国家主席。

然而，董必武胸怀革命事业的大局，曾不止一次地在家人面前表示自己的心愿：辞去领导职务，到农村去蹲点。

他的女儿楚青笑他：“你到农村能干什么呢？”董必武认真地说：“我可以拾粪哪，老农不是每天拿着粪叉拾粪吗？”他边说边比划拾粪的动作，把家里人都逗笑了。

## “厚待”陆诒

1944年，正当国共两党斗争随着抗日战争胜利而矛盾日趋尖锐复杂的情况下，原《新华日报》记者陆诒因对形势做了错误的判断，对当时尖锐的政治斗争和根据地艰苦的战斗生活感到害怕和厌倦，决定要离开报社；离开报社，就意味着脱离党，脱离革命。《新华日报》的领导和办事处的同志们听说后，都非常气愤，骂他是可耻的逃兵，是一个软骨头，是一个怕死鬼。

董老知道后，对大家说：“同志们的正义感，爱党的心是好的，但是一味厌倦和鄙弃他，于事无补，应当尽力挽救他才是。”

他一方面说服大家不要冷嘲热讽，另一方面亲自找陆诒谈话做工作，他把陆诒叫到自己的房间，给他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对他要脱离党、脱离革命的行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教育，真是做到了仁至义尽。但是陆诒并没有接受董老的忠告和党组织的帮助，执意脱离革命，要走。临行前，董老再三说服大家，不要当面羞辱他，并诚恳地对陆诒说：“你虽然暂时离开了我们，我们不能做同志，但是仍可以做朋友，来日方长，后会有期。以后，如果有什么困难，仍旧可以来找我们，我们一定会尽力来帮助你，不必有什么顾虑。”

1946年五六月间，董老以中共代表身分赴上海、南京与国民党谈判，两次遇到以《联合晚报》记者身份出现采访的陆诒，当时陆诒的心情是十分复杂的。但是董老仍旧象过去在办事处工作那样，热情与他交谈，谆谆教导他在采访时应该怎样做，不该怎么做。董老在火车上还专门请陆诒到自己的软席包厢中谈话，谈形势，谈办报，问陆诒的生活、学习和工作情况，也回忆在重庆那段艰苦而有意义的生活，好象根本没发生过陆诒脱离党、脱离《新华日报》那桩不愉快的事似的。

董老越是风度恢宏，虚怀若谷，陆诒越是百感交集，后悔莫及，忍不住向董老检讨脱离党、脱离革命的严重错误。董老诚恳地劝导说：“人非圣贤，谁能无过！任何严重错误，接受了教训，坚决去改就好。不要老是回头看，老是记挂它。过去的已成为历史了，我们应当重在今后，应当在今后工作实践中时刻遵循党的教导，照着党所指的方向继续奋斗，坚定不移！”

董老的博大胸怀和诲人不倦的精神，使陆诒刻骨铭心，终身不忘。虽然他脱离了党，但爱国之心尚存，在解放前和解放后，还是为人民做了不少有益的事情。

## 痛责姐夫

50年代初，董必武同志的夫人何连芝带着三个孩子来到阔别多年的老家武昌，代表董老看望董老的姐姐。董老的姐姐年老耳聋，一直在老家过着清贫的生活，是董必武同辈中唯一的亲人。从那以后，董老的姐夫，和董老家经常来往。如果董老路过武汉，少不得把姐夫接到招待所见见面；如果董老在北京，经常接姐夫到北京玩一玩，关系很是融洽。

一年，董老的姐夫坐火车到北京，因事先没有和董老打招呼，也就没人到车站去接他。董老的姐夫就自己叫了一辆三轮车径直来到当时董老的住处——城北小石桥胡同。下车后，一个钱未付，就进了董老的家。三轮车工人找进家去，正好碰到外走的董老夫人何连芝同志，三轮车工人指着董老的姐夫说：“这个老头自称是董必武的姐夫，下车不付钱就走了。”何连芝听后连连致意道歉，立即向三轮车工人补交了车钱。

晚上，董老回家后听说了这件事，非常气愤，对着姐夫大发了一次脾气。“共产党怎么样？许多人在看，许多人还不了解共产党的官和国民党的官究竟有什么区别，你的作法恰恰说明共产党领导人的家属和国民党官的家属是一个样的。这叫我能不生气？”停了一会，董老语重心长地说：“做什么事都要考虑到对党的影响，这才是共产党员咧！”

孩子们还是第一次看见父亲发这么大的火，都把董老的话牢牢地记在了心里。



## 迁 居

新中国成立后，董老任最高人民法院的院长，住在名鼓楼后的旧王府内。

这个院子很大，房子的建筑布局十分讲究而且合理，雕龙画栋，很有气派。院子里有一个很大的后花园，花园是南方园林式建筑，水榭楼台，典雅幽静。花园里到处栽种花草树木：春天有海棠花、桃花；夏天浓荫蔽日；秋天满架的葡萄、满树的海棠和大红枣，还有盛开的月季花、米兰，整个花园香风阵阵，一派生机；到了冬天，银装素裹，更是别有一番情趣。孩子们非常喜爱这个家，每天晚饭后拉着爸爸到这花的海洋中散步、嘻笑、玩耍；董老也非常喜欢这个住所。

可是，有一天，董老还是决定搬出这个住所，准备举家搬进中南海。孩子们听说后，非常不理解，拉着爸爸嚷道：“不搬！这个地方那么大，好玩，别的地方我们不去！”董老笑着听完孩子们的话后，认真地却不是严肃地向孩子们解释说：“这个地方房子好，花园也很漂亮，到哪去找这么好的地方呢？”董老伸出握拳的左手，用右手扳开食指，缓缓地说：“第一，我们国家现在还穷啊！住在这里，为我一个人，要有个警卫排，要单独烧锅炉，要费多少煤，每天要人坐车跑到这么远来送文件。这样要占用国家多少劳力、物力啊！搬到中南海里，这些问题都统一解决了，为国家节省了不少人力物力，我还不该搬吗？应该搬！这二呢？”他说着伸开中指：“住在这里我上班太远，要坐很长一段距离的汽车，这样每年要用掉不少的汽油。如果住进中南海，再到高院去上班，路程近了一大半，就可以节省不少汽油。你们说是不是？”望着孩子们的小脸，他欠起身，笑着又说了一句：“第三呢，你们到了中南海，看电影也就方便多了嘛！”孩子们微微地笑了。

不久，董老一家就搬入中南海怀仁堂东侧的一套两进的院子。一直住到“文化大革命”中的1967年。1968年初春，董老不屑与陈伯达为邻，毅然搬出中南海，搬到六部口附近的一个院子里。董老站在院子中央，舒畅地把双手举过头顶，活动活动腰后，笑着对女儿说：“楚青，我们可以上街走走了吧？”

## 廉洁楷模

董必武是廉洁自律、克己奉公的典范，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他都能始终如一。1945年、1954年和1958年，董老受党和人民的委托先后三次出国。三次出国，他不仅出色地完成了党和人民交给的任务，而且在生活上厉行节约，更是为人民树立了楷模。

至今还保存着1945年他在赴美国期间亲笔记的一份收支账目：“董捐生活费美金壹仟贰佰陆拾元整”，“董捐交际费美金贰佰元整”，“董交治装费美金壹仟壹佰捌拾伍元整。”原来他把极力节约下来的这2600美元都无私地交给了党。

在支出栏内，连数目不大的一笔医药费和两笔邮电费都记得清清楚楚。

特别是1954年那次出国，所发生的两件事更是反映出董必武同志的高贵品质。在那次出国期间，东道国送给中国代表团每位团员一笔为数可观的生活费，照顾客人们买些日用品和纪念品。代表团的活动日程安排得很紧，没有时间花这笔钱。个别团员都要求给点自由时间去一次当地的百货商店。作为团长的董老不仅没有同意，而且在代表团工作会议上和大家一起商量这笔钱如何处理。他建议留给我国使馆作为公用。有个团员表示不同意，说按照财政制度，使馆没有这个收入项目，怕不好办；董老向当时在场的我国大使问道：这样做可不可以？大使说可以。于



是全体团员就都把钱留给使馆充作公用了。

在临出国前，董老十五岁的儿子对一位随行的工作人员说他想要一架照相机。这位同志出国后聊天时随便提到这件事，使馆同志就给买了一架照相机带回北京。这件事自始至终董老一点都不知道，只是当他看到孩子摆弄照相机时，追问情由才真相大白。董老狠狠进行了批评，并批示秘书立即带上相机和相当于这类相机市价的一笔款到外交部去作检讨，请外交部决定处理办法：留相机，还是留款。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同志深知董老一贯严于律己，公私分明，经过再三考虑，最后留下了相机。

### 三回红安

解放后，董老三次回到故乡红安。他视察田野、工地，走访干部、群众，赋诗题字，勉人励己。

1956年3月的一天，董老第一次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红安。

董老刚住下，消息传开，前来看望的人接踵而至。年愈七旬，须发斑白的董老，极高兴地迈出大门和大家打招呼。不一会，看望董老的人越聚越多，执勤的同志感到为难，有位领导干部示意劝阻，董老立即摆手，说：“不得事，这是回到老家来了。我和大家见见面。”说着，他缓步走到院子中间，和来看望他的干部、群众一一握手交谈，乡亲们都鼓起掌来，董老也跟着鼓掌。掌声和群众的心声交汇在一起，人们沉浸在幸福的激流中。

回乡的第一天，董老就到处走访。县委负责同志陪他视察了武家畈、南门河、北门岗等处，接触的群众多了，董老非常满意地说：“这就好嘛！”傍晚才回到县委机关。县委两个同志站在走廊交谈情况，商量董老下一步的活动安排，他连忙从卧房里走出来，说：“这样吧，我离乡的时间长了，今天和群众见面的时间又短，

我还想请几位干部、群众代表，在一起谈叙谈叙，你们看行不行？”

第二天，董老在县委机关会议室，亲自主持座谈会，邀请了解甲归田的红军老团长、老中医、自己的亲属等 17 人，大家陆续到来，董老一直迎接到楼梯口。先到的同志见董老没入座，也都不愿意就座。董老笑着说：“今天你们是客人，我是主人，快坐快坐。”老中医李云阶说：“您十八载没回老家，才是真正的大客人，你坐了，大家自然要坐的。”

“好，好。”董老这才坐下来，还打趣地说：“我们都不是客人，都是主人，都是新中国当家作主的主人，对吗？”说得大家心里热呼呼的。

1958 年 3 月，董老第二次回到红安。

从武汉动身的时候，董老不肯坐小卧车，坚持要与省委农业检查团的同志一道坐大交通车。

到红安的第一天，董老就到马鞍山水库工地视察，当数千名民工发现董老来到工地时，立刻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董老向民工频频挥手致意，高声说：“我向你们表示慰问，祝你们早日修好水库！”董老的关怀给了民工们以极大的鼓励，纷纷表示一定提前完成任务。

董老在八里湾视察了三个小时，然后在那里吃中饭。他看到桌上摆了八个菜，不高兴地说：“当干部不能脱离群众，不能搞特殊化，要在勤俭节约上带头，吃饭要从简，菜不能搞得过多，今天你们把菜办多了。”张体学同志连忙说：“今天这桌菜是我叫办的。”董老笑着说：“是你叫办的，超过了伙食标准也不好。”大家又解释说：“董老多年没回过红安，都是几个家乡菜。”董老跟大家说笑了一阵，再次叮嘱干部不要搞特殊化。后来给董老办的伙食，总是四菜一汤。

离开红安的前一天，县委负责同志对他说：“在县开会各区